

魏源今文经学影响下的 古文新变及其历史意义

武道房

内容提要 在文以载道方面，魏源举起今文家道统之旗，排斥汉宋家言，在桐城派、汉学家的道统之外，另辟文以载道之新境界。魏源的古文观念来源于他的今文经学思想。他以古文为载体，倡言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经世致用，从而与桐城派喜谈道德心性、汉学家喜作考经论史之文区别开来。清中叶汉宋之争引发了文学上的骈散文体之争。魏源古文骈散兼行，雄恣古奥，能于桐城派古文与汉学家骈文之外自树一帜。魏源是嘉道时期古文发展处于转捩点上的重要作家，他在古文中所体现的新道统、新思想、新内容、新形式成为清末文学思想革命或文学改良运动的活水源头之一。

关键词 魏源；今文经学；古文新变；桐城派；骈散之争

魏源是嘉道时期开新风气的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清史稿·文苑传》总论清代文学，列举了12个清代重要文家，其中有魏源^①。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清朝不立宗派的古文家共25人，其中亦有魏源^②。魏源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不少史家认可。作为嘉道时期标帜性的作家，他的古文观念与其今文经学有何关联？其古文创作与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相比有哪些创新？其文学史意义如何？上述问题，学界虽有部分涉及，但深入讨论的空间仍然很大^③。

学界关于魏源今文经学研究的成果颇多，笔者无意对此另添新见，而仅是关注魏氏今文经学家的道统立场对其古文写作的意义。本文着力点在于，揭示魏氏今文经学与其古文观念的内在沟通和联系，从经学史、文学史的视野看今文经学是如何影响魏源的古文新创的，同时讨论他古文新变的历史意义。

文体意义上的“古文”，最早由韩愈提出；他认为自己的“古文”继承的是先秦两汉奇句单行的散文传统，视六朝以来的骈体文为“俗下文字”（《与冯宿论文书》）。这个“古文”在概念上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散文，是指一切取法先秦两汉文法、句法的无韵的各类散文，甚至

包括著述文字在内^④。韩愈的古文概念还有另一层涵义，即“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简言之，即是文以明道，以道为主。这个“道”按韩愈的说法，指的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等儒家圣人之道（《原道》）。韩愈“古文”观念的两层涵义，后人理解虽然有宽有狭，但大致规定了唐以后古文发展的走向。嘉庆十九年（1814），21岁的魏源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⑤。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魏源不论是对古文“道”的理解还是对古文内容与语言形式的认知都发生了深刻的新变。

一 超汉轶宋：“文以载道”的新境界

文以载道是韩愈之后儒家古文写作的传统，但什么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后世儒者可谓见仁见智。梁启超指出：“（后儒）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寝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寝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⑥“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

而必谓出孔子。”^⑦这种人人自谓得孔子之真道统的现象，梁启超戏称“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姬得一钱，诟詈以相夺”^⑧。一部儒家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历代儒者对孔学不断进行再阐释并各以孔子道统自居的历史。晚清魏源同样如此。他以今文家视野中的孔子为真道统，排斥他那个时代宋学家、汉学家所理解的孔子之道^⑨，不仅打开了思想史的新局面，也给以明道为职志的古文写作掀开崭新的一页。

乾嘉时期的古文作家大致分成两派，即桐城派与汉学家。桐城派不仅是个文派，同时也是个学派，而且还是与乾嘉汉学相对垒的宋学派的主要阵地^⑩。汉学家不仅做考证，同时也写作古文，有大量的别集行世。二派因学术取向不同，于是在古文究竟载什么“道”的认识上，他们之间有了尖锐的分歧。

桐城派在散文史上一大特点是，将程朱之道与唐宋八大家的写作技法结合起来，试图终结长期以来理学家谈性理与古文家作文章二水分流的局面，使所谓儒林与文苑合为一体，这是其新鲜之处，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地方。

方苞虽然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⑪，但实际上，他看重韩、欧的，只是其写文章的技法，而不是其文中所载的道。在方苞看来，《左传》《史记》以来，包括唐宋八大家在内前后相承的古文写作义法，虽然“各出之径涂”，但这些写作技法真要学起来，不过是“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⑫。古文写作真正难的是“定其祈向”，换言之即作者是否能找到人生所要依附的道。就明道而言，方苞对唐宋八家都进行了批评。他说柳宗元于儒家六经之道“尚或不详”，欧阳修“未通其奥赜”，三苏于道则是“概乎其未有闻焉”。方苞只是稍微肯定了韩愈、曾巩、王安石三人“笃于经学”，但接着又说他们“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⑬，批评他们见道不够纯粹，这与宋代理学家批评韩愈等文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⑭。在此严苛的标准下，方苞认为“艺术莫难于古文”，道与文并盛的古文家，自周代以来，不过“仅十数人”而已^⑮，其艰难可想而知。就见道而言，方苞认为只有程朱能接孔孟之传。他在《与李刚主书》中说：“‘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

谁与？”^⑯方苞写此信时，李塉之子刚刚夭亡。方苞作为李塉多年的朋友，说此话有失厚道，但可见其卫道之严。到了姚鼐的时代，汉学家也加入了反程朱的阵营，姚鼐于是将诋毁程朱的王阳明学派、颜李学派、汉学家一并开骂：“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⑰

乾嘉时期，汉学成为显学。汉学家纷纷运用考据训诂手段，以考证孔孟之道的历史原意，而宋学开始为大雅所不道。汉学家提起宋学往往讪笑之、排击之，甚至出现“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⑱的现象。皖派汉学巨擘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杂糅了释老，并不能代表孔孟道统。戴震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⑲戴震“由字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的治学方法，目的是通过研究儒家经书的语言文字、名物制度，以发明孔孟之道的真义。段玉裁论戴学时指出：“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⑳即是说，通过考证，戴震弄通了儒家圣人之道。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及阮元的《性命古训》虽是解字的书，但也含有纠驳宋儒的目的。对于理学家津津乐道的性、命、仁、理、道等哲学词汇，汉学家们通过字源考证得出了区别于宋儒的新解释，并批评宋儒解说杂糅释老，捕风捉影，多为不稽之谈。如阮元指出：“六朝人不讳言释，不阴释而阳儒。阴释而阳儒，唐李翱为始。魏收所云‘虚静通照，湛然感应’者，此明说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辩也。李翱所言寂然、静明、感照、通复者，此直指为孔孟之性，不得已不辩也。”^㉑阮氏批评自唐代韩愈的弟子李翱以下直至宋、元、明诸儒，其经学皆混杂释氏以改窜孔孟原义。

除上述提及的皖派、扬州学派汉学家之外，汉学的另一重镇吴派学人如惠栋、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诸人，亦主张恢复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六经本义。惠栋家族三世传经，其父惠士奇著《半农春秋说》，凡言宋儒必力斥之。如批评宋儒“好言义，而不考其事与其文，往往失之”^㉒；指责宋儒不信《春秋》三传，而“顾信俗

儒啖、赵之说”，从而使“学者惑焉”²³。批评宋儒解“一贯”、解“仁”都有失古义。甚至公然说“后世俗儒之议论，甚于秦灰矣！”²⁴其所谓“俗儒”，不仅包括上承汉唐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引起经学大变的啖助、赵匡，而且连同后世理学家均包括在内。惠栋承继家学，著《九经古义》，遍考群经，其方法是“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²⁵。虽然标榜自己考证的目的，是求六经之真，而实际上乃是“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凡古必真，凡汉皆好”²⁶。吴派学人心目中的“汉”，乃是指治古文经学的东汉经师，其治学方法是通过字、辞考证以通经书大义。

汉学风气的大盛，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梁启超指出：“其时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兹学（汉学）最有力者，曰纪晓岚、阮芸台、毕秋帆……于人心风俗所影响，固不细也。”²⁷在这种形势下，乾嘉时期的学风是“醞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²⁸。由于汉学的冲击，桐城派的处境有些不妙，他们所信奉的程朱之道，已普遍成为学人嘲笑的对象。

在汉学家看来，程朱之道既然不是孔孟之道，于是桐城派的“古文”也就失去了载道的合法性，成为汉学家所讥笑的“伪古文”。道光时期，蒋湘南便讥讽桐城派为“伪八家”“伪古文”。对于桐城派所崇尚的程朱，蒋氏质疑云：“吾又何敢谓圣人之道之必在于理学乎？”理学既不能见道，那么真正的古文则只能是汉学家的古文。因此蒋湘南认为，配称“古文家”这个称号的，在当代应是“韞椟六经，时时与圣人相见”，得圣人之真意的汉学家如戴震、钱大昕、汪中、张惠言等人²⁹。

魏源治学最初从宋学、汉学入手，然后转入今文经学。在他看来，圣道固然不在宋学之中，更不在汉学之中，而是在西汉今文经学那里。西汉今文经学也是汉学的一种，但清代所谓汉学，在语境上乃是指东汉古文经学。清代汉学家，无论是皖派、吴派，还是扬州学派，走的都是东汉经师的路。在魏源看来，东汉古文经是伪造的儒经，并不能代表周孔之道。他认为，孔子及其七十子后学的微言大义，保存在西汉的今文经学之中，清代汉学家自以为是的来自于东汉经学家的

道统其实并没有圣门合法性。

魏源著《书古微》《诗古微》详说此义。在《书古微序》中，魏源认为，西汉孔安国得于孔壁的《古文尚书》与欧阳、夏侯所传伏生之《今文尚书》本是一家，大同小异，差别不大，并非判然二家。东汉杜林自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宏，贾逵为之作训，并由马融作传，郑玄注解，此后杜本《古文尚书》遂显于世；但杜本《古文尚书》与伏生之《今文尚书》判然为二，明显不同。到了东晋，梅赜的伪《古文尚书》出现，遂又取代杜林之《古文尚书》而行世，马、郑为杜本所作的传注亦废而不行。魏源批评阎若璩以及其他汉学家只知攻击东晋梅赜之《古文尚书》为伪，而又错认马融、郑玄的注本为真古文。在魏源看来，其实东汉马、郑本与西汉原有的真古文“风马牛不相及”。他进一步举证说：“西汉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传》所言者，欧阳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迁所载孔安国说必同之，犹《诗》齐、鲁、韩三家实同一家，此汉儒师说、家法所最重。若东汉古文则不然，马融不同于贾逵，贾逵不同于刘歆，郑玄又不同于马融。”³⁰魏源意在说明，西汉的今、古文《尚书》都是真的；而东汉马融作传、郑玄作注的《古文尚书》是假的，是杜林伪造的本子。

在《诗经》今古文方面，魏源著《诗古微》，力主齐、鲁、韩三家今文说，排斥作为古文经的《毛诗》。他认为，《诗经》今文说，才真正体现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魏源结合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提出“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读《国风》。正、变之例不破，则《雅》《颂》之得所不著，而礼乐为无用也；美、刺之例不破，则《国风》之无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³¹。也就是说，古文经《毛诗》的“美、刺、正、变”之说诗体例，歪曲了圣人制礼作乐的根本意图，只有今文三家《诗》才合乎周公、孔子之道统。

魏源今文经学立场，实是受庄存与、刘逢禄启发。清代以来，汉学家研治东汉古文经学，至孔广森治《春秋》公羊学，始有清代今文经学之名。庄存与、刘逢禄等常州派学人推演《春秋》公羊义并兼治群经。魏源承其绪，作《书古微》斥马、郑，作《诗古微》诋《毛诗》，以扶持今文

经学。但刘逢禄治公羊学，并不排斥《毛诗》，今古文门户之见尚不分明；从魏源开始，古文经学受到全面排斥，致使今古文经学形成壁垒^②。这是魏源学术与常州学派的区别之处。

魏源用汉学的考证法入室操戈，证明古文经学的圣门非法性。既然古文经是伪经，那么乾隆以来考释古文经的汉学家如惠栋、江声、臧琳、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做的“诂训音声，瓜剖瓠析”之类的考证工作全部失去意义，用魏源的话说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出于无用之一途。”^③在他看来，乾嘉汉学不仅找错了治经对象，而且治学方法亦不可取。

对于东汉经师以及清代汉学家的人品，魏源也不以为然。他批评东汉古文经师马融为人“贪肆”^④；揭露戴震校《水经注》剽窃赵一清的校勘成果，指责戴震成名后对其师江永不敬。这种品行在魏氏看来“攘他氏之书，犹其事之小者”^⑤。他还批评崇尚汉学的纪昀因不喜宋儒而对朱子妄加诋诃^⑥。总之，魏源对那些汉学家们甚为厌恶。他说：“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⑦魏源认为，汉学家不仅治东汉古文经路子不对，即便人品，也很成问题。

魏源否定东汉古文经学，等于破坏了清代汉学家治学的基础。在他看来，真正的周孔之道在于西汉经学。他认为西汉十四博士以及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的经学，学有师承，上承孔门七十子之微言大义，代表了真正的儒家道统。如果真有所谓“汉学”之名的话，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绝非流行后世的东汉古文经学。他说：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⑧

这是说，清代汉学家的学术只是文质演变中的一个阶段，其历史使命现已终结；通过今文经学求取儒家的微言大义，恢复儒家贯经术、故（政）事、文章于一体的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才是儒家之道的最高阶段。

皮锡瑞评价说，魏源以及其他治今文经的学者，虽有“议论太畅”“立论太果”“更参臆说”

之弊，但其学术上的贡献在于，于举世不为之际，研究今文三家《尚书》、今文三家《诗》，使“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⑨。这是从学术上说的。从文学上看，魏源治今文经学的意图在于，发扬西汉经师经世致用之学风，以经术缘饰政术，以文章贯通经术、政术，从而“道在是，文亦在是”，开一代“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的新文学风气。在魏源看来，无论汉宋学，都有脱离现实、不能通经致用之流弊。魏源以西汉今文家经世致用思想为旗帜，重新建立起“古文”的道统与文统，从而使其古文与桐城派和汉学派区别开来，并成为清代散文史上扭转时代风气的关键人物。

二 经世与变法：今文经学影响下的古文写作

宋学家、古文经学家亦言经世，他们都认定自家解释的孔教才能治世。但如何才算是经世，宋学家、古文学家、今文学家的理解是不同的。周予同说得好：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⑩

古文经学家站在史学的立场，主张六经皆史，他们治学的目的是通过考释字、辞、句，以弄清六经的历史本意。戴震通过考释儒经，得出的结论是：“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⑪戴震理解的孔孟之道是，使人人达情遂欲而后天下治。他批评宋学家所解释的孔孟之道是“以理杀人”。宋学家以孔子为哲学家，又援引释、道家言，对儒经中的心、性、理、气等范畴给以全新的解释，成为一种超越的、内省的

道德哲学。其长处是严于律己，有利于士风端正；流弊是学问空疏，短于处理世务。而今文学家视孔子为政治家，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能处理世务、治国理政为学术旨归，其特点是功利的，进取的。他们经学上的流弊是放言高论，多狂妄荒诞。

三派学风不同，文章内容自然不同。桐城派在道统上宗宋儒，他们的古文多写道德人品，歌颂清官廉吏、安贫乐道、忠孝节义，津津于理学式的身心修养。清代汉学家之文集，多半是考经证史，谈《说文》说《尔雅》，为考经书中的一字一词，喇喇千百言而不休。在古文写作上，汉学家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虽然也主张学习唐宋八家的笔法，但他们古文中所载的道与程朱之道是不同的。如钱大昕著文反对宋儒鼓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妇女“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②，“先王之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③。这些颇有现代性的女性观居然出于他的经学考证。钱大昕《臧玉琳经义杂识序》暗斥宋学为释氏之学而非儒学：“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④王鸣盛的古文，在当时即被推为巨手，他自称“用欧、曾之法，阐释（慎）、郑（玄）之学”^⑤。可见汉学家即便使用韩愈主张的散体写作古文，发挥的却是东汉儒家的义理（道），与桐城派以古文载程朱之道是格格不入的。

到了魏源生活的嘉道时期，中国社会正进入数千年所未有的变局时代。就内忧来说，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起义此起彼伏，蔓延十数省，长达几十年；就外患而言，西方列强经过工业革命，正在为资本和市场寻找出路。他们用炮舰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挑起鸦片战争，使清王朝处于丧权辱国的境地。此时，无论宋学家如何宣讲耻言功利、道德修身，还是汉学家能否考证出三代历史真相，对于时代危机而言，都处于失语和尴尬的境地。于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登上了时代的前台。

魏源经过艰苦的考证，论证东汉古文经学的非法性，试图确立西汉今文经学的圣门正统地位（至于魏源的考证是否能立得住，是否合乎儒经之真，此是另一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争夺儒家经学的解释权，以发扬今文家倡言改革、经世致

用的古老传统。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他们虽然认为，六经有前代的史料，但这些史料只是孔子借来“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着重的，不在于六经的历史事实，而在于寄托微言大义。在西汉今文家眼中，孔子被神化为借六经为汉朝立制的“素王”，其学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性和变革精神。魏源认为西汉经师的学术旨归是：

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雋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⑥

魏源意在说明，研治儒经的目的是能占变知来、匡正世主、进谏、决狱、议定制度、辅道正俗、治理国家、经世致用，他认为这才是孔学的真精神。魏源推崇西汉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那样能经世致用的政治家、思想家，他认为西汉经生最能把握孔学之真，换言之，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儒者的灵魂所在。这样的经学思想，使魏源的精神视野既不同于宋学家向内（心性）转，也不同于汉学家向后（历史）看，而是敢于向现实看，向世界看，向未来看。

魏源与汉、宋学家最重要的不同是，他以今文经学缘饰政术，为改革、为变法寻找经学的支撑。他接受了今文家公羊三世进化说，反对崇古，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⑦；“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⑧；“师夷长技以制夷”^⑨。这些大胆的思想（道）是当时汉、宋学家所未有的，与法家思想倒是相近。他以公羊学进化说为利器，积极鼓吹变法革新思想。他说：

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

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剽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④

其实不仅宋学家好言三代全是天理，清代汉学家也热衷于考三代时的明堂、弁服、车制、丧祭礼，意在复三代之礼以适用于当今。在汉、宋学家的眼里，古人胜过今人，制度、道德都是三代的好。就复古、崇古而言，汉宋学派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于复古的途径，汉宋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而已。在魏源看来，他们都是读周孔之书以误天下的“庸儒”。正确的方式，应是师其意不师其迹，也就是说学习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用心，而不必因袭其制度。魏源认为，三代并非俗儒想象中“全是天理”的黄金时代，后世在制度先进性上要超过三代，而且就秦汉之后的历史而言，也是后代胜过前代，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他说：

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⑤

魏源认为，历史上的制度变更是时代的选择，自有其不得已者。这种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像汉、宋学家那样向后看，以致沉入崇古、迷古的泥潭。魏源的历史进化思想，意在为现实之改革变法寻找理论的依据。

魏源早年跟理学家姚学壤学习宋学，又跟胡承珙问汉儒家法，他对当时的汉宋学都有相当的了解。站在今文家经世的立场，魏源对于汉宋之学并非全部否定。在经世的旗帜下，魏源学术非常有包容性。虽然魏源《默觚》一文在讨论利、命、仁、性、天道、生死鬼神等哲学话题时并不赞成理学家言，但他对理学家严于自律的人格甚为推崇。他对程、朱、陆、王之学术各有訾议，但仍从做人的角度赞誉他们为“百世之师”^⑥。他

作《归安姚先生传》，对姚学壤“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的人品很是敬重。对汉学家的考证学，魏源批评其圣门非法性以及学风上的短钉琐屑、脱离现实之弊，但也不没其长。他吸收了汉学派无徵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经世致用上来。当然，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通过考证意在说明儒家经学最重要的精神是经世致用，是解决现实问题。他编写的对后世思想史乃至对日本明治维新都有极大影响的《海国图志》，就是在林则徐组织人翻译的西人所著《四洲志》基础上，再考证以“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⑦，钩稽贯串，编写而成。总之，魏源古文中，虽有不少考证文字，但大多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的。

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持极端的政教功利文学观。他主张“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⑧。道德、政事、学问、教化等凡能经世者，都是文的表现对象。就学问而言，经术、政事、文章应通而为一，不可分为三事。他认为，《六经》是文的典范，《诗》通于礼乐教化，《书》制诰、奏章、载记通于政事，《礼》为治术，《易》占变知来，《春秋》断事；孔子整理《六经》，所谓“文不在兹乎”，这个“文”，乃是指政教经世内容的外显形式。他批评宋玉、景差、枚乘、司马相如之文以及萧统、徐陵的文学选本，不满他们只重文采，脱离了六经文的经世传统，开后世“文始不贯于道”之恶例。他心目中理想的文，是发明“鬼神、礼乐所以幽明，食货、兵刑所以因革，公卿、师尹、士女谣俗所以失得”，能够契合《六经》经世传统的文^⑨。就诗学而言，他反对萧统《文选》“专取藻翰”，反对钟嵘、司空图、严羽“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致使“诗教再蔽”，从而破坏了《诗经》的教化精神^⑩。对于当代文坛那些讲究文采藻绘、无益世用、售世哗世之文人，他讥讽为“巧言如簧，颜之厚矣”^⑪。

不仅魏源论学之文鼓吹经世、倡言变法，他所作纪传、墓铭、碑志文，传主的道德或政术都是卓能自立的人物。如《归安姚先生传》表彰姚学壤的德行；《陶文毅公神道碑》记陶澍改漕米海

运、革新盐政的历史功绩；《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写王凤生“刑名、漕赋、水利、鹵政”等实学治绩；《荆溪周君保绪传》写周保绪懂军事，善击刺骑射，还能运用数学开方丈量土地，其学有实用，等等。

魏源所写大量讨论时政的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如《筹漕篇》《海运全案序》等文通过考察漕运的历史变迁，结合古今时势，提出改变凭借运河进行南粮北运的传统做法，建议招商雇船将南方的官粮通过海运输送至北京。《淮北票盐志叙》《筹鹵篇》《淮北票盐志凡例》是讨论票盐改革的文章。魏源关于漕运、票盐改革的建议，得到江苏巡抚陶澍以及江苏布政使、漕运总督贺长龄的积极支持，付诸实践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漕运、盐政、黄河水患、夷务、内乱，是当时清政府非常棘手的五大难题。对于治理黄河，魏源通过研究历代治河经验，从中寻找黄河决口的规律，主张顺应水势由高就下之性，让黄河北流改走故道。他作《筹河篇》反复申论此事，却受到当政者反对和讥笑。魏源断言“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果然，在13年之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自行向北从大清河流入渤海。针对各地农民暴动的现实，魏源留心军政，写作《城守篇》《军储篇》《吴农备荒议》《湖南苗防录叙》等文章，为清廷献言献策，倡言改善民生，剿抚并用，从根本上消除内乱。魏源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是较早睁眼看世界的杰出思想家。他最先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走了出来，认识到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强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⑤，“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⑥。他在《海国图志叙》《道光洋艘征抚记》等文章中反复申言这个思想。

魏源这些文章都是向现实看，向未来看，向世界看的，之所以如此，与其今文家关注现实、法后王、主变求新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些思想支配下的古文写作，自然不同于汉学家、宋学家或考古或言空言德性的文章，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章绘句藻之文。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变局中，魏源关注现实及未来、倡导变法的古文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进沉闷的文坛，让人耳目为之一新。

三 调和汉宋，骈散兼行： 别开生面的新文风

嘉道时期文学上的骈散文体之争，是在汉宋学术之争的背景上出现的。桐城派在古文语言的审美范式上，推崇秦汉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弃骈文于古文之外，在是书序中明确地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桐城文家多不喜骈体，古文中夹杂骈俪语对他们来说是禁忌。汉学家不仅反对桐城文家的程朱道统，而且也否定桐城派的文统。号称“汉学护法”的阮元认为，孔子所作《易·文言》、子夏所作《诗序》都是骈句，而唐宋八家和时下桐城派“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谓文也”。他进一步说“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⑦这等于以反孔子的罪名来否定桐城派的“古文”。汉学家凌廷堪也申言“于方望溪义法之说，终不能无疑”^⑧，并批评桐城文家所膜拜的韩愈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⑨。总之，汉学家以“用韵比偶”之文为古文，意在将桐城文章逐出“古文”名称之外。汉学家如孔广森、汪中、孙星衍、阮元、洪亮吉、凌廷堪等人，不仅做朴学研究，同时也是骈文高手。他们的骈文成了与桐城文章相对抗的文体^⑩。

当然，汉学家的批评不足以让桐城派心服。桐城派虽然在考证上，不足以与汉学家争雄，但在古文写作上，有一整套的家法，并自谓文章正统，而且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姚鼐以及后来的方东树等人都有责骂汉学家不敬程、朱的文章，但对他们鼓吹骈俪文为文之正统的说法，并不屑于一辩。事实上，汉学家队伍中，主骈文为古文的毕竟还是少数人。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仍推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技法，只是他们要表现的“道”乃是东汉经学家传承的道，不同于程朱之道而已。即如阮元、孙星衍、汪中、凌廷堪诸人，虽推尊骈体才是所谓的“文”，但他们也写下大量

的散体文字。就艺术成就而言，平心而论，汉学家的散文是远远比不上桐城派的。因此，虽然有骈散之争，但两种文体基本上仍是二水分流，各有各的天地。

到了龚自珍、魏源登上文坛，骈、散分流的局面才得以改观，呈现合流的趋势。在嘉道学坛、文坛上，龚自珍、魏源齐名，世称“龚魏”。他们学术上相通，都主今文经学；古文写作上，他们相互切磋，互受影响^④，以其骈散兼行、雄博奇丽之文，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龚自珍反感桐城派画地为牢、以家法示人的作法。他批评说：“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异人舆者，又必有异之者。曾曾云初，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何也已！”^⑤暗中批评桐城诸老以唐宋八家的文章示人以义法，抬八家轿子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大批追随者，使他们自己也坐上了追随者抬的轿子。龚自珍对这种文坛现象很不屑，并说自己不去凑论文的热闹，“未尝为书一通。高扁笥中，效韩媿柳，以笔代口，以论文名，覆按无有”^⑥。但龚自珍对自己的古文又很自信，说自己“不戮于言，言满北南”。“戮”有“套子”之意。不戮于言，意即写作不设禁忌，不格式化。言外之意，对桐城派的义法说很是不屑。龚自珍的文章，蔡元培曾有中肯的评价：“定庵为文，结体于《公》《穀》《檀弓》《考工记》，而调气于诸子、太史公及释藏，而又言之有物，故其文恣肆而实谨严，精悍而极疏宕。”^⑦在语言风格上，龚氏散文散行中有骈偶，瑰丽中有古奥。

魏源早年在京师即与龚自珍切磋古文，二人意见较为一致。魏源也每每不屑于论文，除主张功利的、政教的文学观外，很少谈及古文写作的技法。但他的古文与龚氏一样，能于桐城义法之外，自成一体，成就一种骈散兼行、雄恣古奥的新型散文。如《章教谕强恕斋书序》，写宝山县教谕章谦存有经世之才，当宝山地区发水灾时，他发起众人救灾，“以教谕而部勒十余万户。毕赈八阅月，无哗无馁。大吏发帑金数万至，不受，将奏其最于朝，复不受”，可谓是个奇人。7年之后，魏源省亲宝山，结识章叟。文章写他与章叟深夜在海边纵谈经学之情形：

宝山城东北角斗入大海，是日，天风鼓潮殷几席，与谭经声应和如雷。语罢出城，循海塘东西炮台眺望一角海，划然长啸，水天寥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悒悒而归。乌乎！伏生、申公，非经生也；太丘、林宗，非一乡之士也；庞士元、元德秀，非一邑之吏也。“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虎决而尸默者也，鹰扬而龟息者也。”^⑧

写景、抒情、议论都极有生气，有西汉文之气势，有辞赋家之飞扬，散中带骈，廉悍中有疏宕，瑰丽中见古奥，与桐城派稍嫌啾缓、拘谨、气弱的文风是很不同的^⑨。

魏源的论学、论史、论政之文亦多对仗排比，亦骈亦散，音韵铿锵，极富气势和美感。仅举一例如《圣武记叙》：

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闕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教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教民狂则蜚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觴于隍，后日肱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⑩

这段文字骈散兼行，其中句尾用字如莽、狂、荒、羊、墙、堂、隍、藏、商、汤、场等，一气呵成，一韵到底，行文极富气势和音乐感。

魏源此种文风的形成，除得益于与龚自珍相互启发之外，大概还有几种因素。其一，魏源与阳湖派的李兆洛关系甚密。魏源誉李兆洛“近代通儒，一人而已”^⑪。李兆洛亦推崇魏源，亲自为魏氏《诗古微》二卷本作序。李兆洛有鉴于汉宋骈散之争，提出调和骈散的主张。他认为散文语言，应是“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物相杂，故曰文”。在李兆洛看来，自六经出现直至隋代，文体屡变，而文无异名。只是“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以是为与古文殊路”。他不满将古文与骈俪

视为歧路,认为若将二者对立起来,不合乎天地之道“阴阳相并俱生”“奇偶不能相离”之理。他认为唐宋散文与六朝之骈文,其源同出于先秦及秦汉文。因此,李兆洛说:“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脆,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②由是可知,李兆洛主张古文的语言应是恢复六经文及秦汉文奇偶双行、骈散并用的传统。李兆洛的古文观当为魏源所熟知。李氏虽持骈散并用之说,而且编《骈体文钞》以示学人门径,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却并不成功。在李兆洛的《养一斋集》中,更多的是散文,骈散并用的文章其实比较少见。而魏源的古文却是大量实践骈散兼行的理念,故在文坛更能引人注目。其二,魏源力主今文经学,他推崇西汉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之文,而这些西汉大家的文字散行中时杂偶俪,这一点无疑对魏源的古文写作有极大的影响。其三,魏源治经之外,兼治先秦诸子及释家之言。故其文多排比句,简洁而且有力,兼有荀况、韩非廉悍谨严、踔厉风发的文风。

龚魏文章,都自先秦诸子及秦汉文章入手,都注意骈散兼行,沉博雄丽,这是其一致处;其差异,正如黄象离《重刊古微堂集跋》所评价的:“龚氏文深入而不欲显出,先生(魏源)文深入而显出,其为独辟町畦,空所依傍一也。”^③龚文更显古奥,魏文则较显豁,但其空所依傍,在“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④的时代,龚、魏之文,真如凤凰翔于九仞之上,甫一出现,便引起文坛瞩目。

四 魏源古文新变对后世的影响

魏源古文在清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清史稿》说:“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⑤龚自珍、魏源并称,他们都是嘉、道时期开新局面的古文大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魏源古文以新的道统、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呈现于文坛,成为晚清思想革命的滥觞,也开启了晚清文学发展的新走向。

梁启超曾经指出:“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

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⑥曾朴的《孽海花》,借小说中的人物公坊之口评论说,清朝200多年以来的学问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顾炎武、阎若璩诸大儒提出实证的方法来读书;第二期是乾嘉诸儒将经史诸子不可解的古籍都校理成了文从字顺;第三期便提到了龚、魏:“把古人已整理的书籍,进了一层,研求到意义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龚定庵一班人,发生独立的思想,成了这种惊人的议论。”^⑦

魏源接续庄存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学术精神,树立起今文家的道统,这让他在那个时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启超指出:“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⑧以今文经术,作政论文章,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风气。魏源正是在今文经学经世、变法观念的影响下,面对当时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写下一系列政论文章。他思想开放,留心时政,关注边事,成为那个时代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

与魏源同时亦甚有名气的宋学家方东树,在读完《海国图志》后写信给魏源说:“(《海国图志》)于五日内始毕业,乃废然掩卷而叹曰:昔水伯之夸秋河也,及观于海,然后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谓乃今始睹子之难穷也。窃谓得百骏衍,不如得一魏默深。……窃以圣人至道,不出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放之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密。如足下之学,直可建立事功,以经纶世用。而如树所存,真体精微,似亦未可轻蔑。”^⑨方东树是宋学中人,所可自信者,仍是传统理学中的精微之道,而魏源的经世之学前无古人,为一般学人所未曾梦见。难怪方东树直呼为之目眩了。可见魏源文章在当时所引起的震撼!

包括魏源在内的嘉道今文学家,以经学附会

- ⑨魏源对汉学家排斥较多，但对理学家有不少肯定，如他曾作《周、程二子赞》《朱子赞》《陆子赞》《王文成公（阳明）赞》等。但笔者认为，魏源对于理学家，除肯定其部分学理外，只侧重于表彰他们的气节人品或事功，并非认为他们的儒学得了孔子全部真传。
- ⑩梁启超指出：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见《清代学术概论》，第68页。萧一山亦说：“自朴学盛行以后，理学衰微不张……理学之薪传，反为文学家所夺。”其中所说的“文学家”即指桐城派。见萧氏著《清代通史》，第195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 ⑪⑫⑬⑭⑮⑯方苞：《方苞集》，刘季高点校，第906—907页，第165页，第164页，第164页，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⑰如二程说：“韩子之学华，华则涉道浅。”（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8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朱熹批评韩愈“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朱熹集》，尹波、郭斋点校，第36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熹认为自孟轲氏没，圣学失传，至河南二程道统才接续上（《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他批评唐宋八家的话又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
- ⑱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第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⑲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61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⑳①②张岱年主编、戴震著：《戴震全书》（第六册），第353页，第49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 ⑳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王昶《湖海文传》卷三十，清道光刻本。
- ㉑②③阮元：《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第236页，第605、60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 ㉒④⑤惠士奇：《半农春秋说》卷十五，卷七，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㉓永瑆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九经古义》提要，第27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 ㉔⑥⑦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3页，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㉕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第29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07册。
- ㉖蒋湘南：《七经楼文钞》，第311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41册。
- ㉗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㉘皮锡瑞：《经学通论》，清光绪思贤书局刻本。
- ㉙周予同：《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见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第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 ㉚④④⑤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第109页，第362页，第391页，第8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㉛⑥⑦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第220页，第29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 ㉜这段文字，笔者曾在《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一文中有论述，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这里为便于考察背景，择要重复说明之。
- ㉝④据魏源之子魏耆所作《邵阳魏府君事略》，嘉庆十九年，魏源始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见《魏源集》第848页。
- ㉞⑥⑥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207页，第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
- 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卷15），第9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㊱钱基博曾指出六条“桐城文弊”：空洞、沿袭、拘囚、柔弱、狭隘、累琐。吴孟复先生不尽赞同钱说，但也承认“说‘柔弱’是对的”。参见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第204—20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㊲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第77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95册。
- 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 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㊵曾朴：《孽海花》，第2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 ㊶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第243页，《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507册。
- ㊷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五十八，第178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5册。
- ㊸⑧⑧⑧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2页，第485页，第532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培